



人大重阳论坛实录

第一期

张燕玲：

地球村的游戏规则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日

重阳论坛实录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办的一所现代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著名金融学家陈雨露教授任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立足人大，放眼世界；把脉金融，观览全局；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为宗旨，力求为国家发展培养和输送高级金融人才，立志打造一个以“大金融”研究与传播为核心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智库，最终实现金融报国、知识报国的宏愿。



主讲嘉宾：张燕玲（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中国银行副行长）



主持人：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主持嘉宾：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开场白：王文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并欢迎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今年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旨在打造现代化智库的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的设立过程应该说是非常高效的，我们从无到有只用了几个月时间。我以前在报社、媒体工作，当时受到人民大学相关领导的信任，让我组建这个研究院。我在来之前内心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作为一个媒体人，投身于智库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换了一个轨迹，其实从人生规划来讲是非常有风险的事儿。后来我就找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银行家、思想家，她就是张燕玲老师，在请教张老师的时候她就非常鼓励我，我说你能不能当我们未来这个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呢？张老师可以说可以，于是我转头就给人民大学说我可以来人民大学，这是我和张老师之间的故事。

关于张燕玲老师的故事，她的经历我想同学们肯定都知道，朋友们肯定也都知道，我想请我的忘年交、我多年的老朋友刘志勤老师来介绍张燕玲老师的简历。刘老师也是多年以来一直对我有恩的老师，我也是受了他的鼓励正式加盟人民大学。刘老师和张老师是几十年的朋友，所以由他来做主持嘉宾也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先用掌声有请刘志勤先生！

主持人：刘志勤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为张行长的演讲做主持嘉宾，张行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当年她在集团做领导的时候我们都是辅教的，这也是我今天能有幸作为主持的原因。今年重阳金融研究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大金融格局”，由张行长做主题报告，对这个大金融形势势必会有所促进和提高。中国目前三位金融界著名人士：一位是

林毅夫；第二位是朱民；第三位我认为就是张行长。三位大家各有特点：朱民先生的强项在货币方面，他侧重于政策性银行和金融决策，朱民先生也是张行长的同事；林毅夫先生侧重于理论方面，学院式、教学式的理论家；而在理论和实干两方面都强的只有张行长一人！

张行长在银行界好几十年，我在80年代初就认识她，当时我担任外资银行驻中国的代表，有很多业务正是在她的指教下，才逐渐打





开局面，所以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之前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习金融和国际贸易管理的时候，感觉很多东西都是虚的，对于适应中国市场怎么运作一无所知，张行长对我们手把手、案例对案例地进行各方面的辅导和帮助，使我们在金融界逐步发展到今天。我们在金融界三十多年，在三个国家都被认可的，我曾经是三家银行的代表，在德国一家银行，奥地利一家银行，瑞士一家银行同时做代表，当时在国内是没有的，国内有另外一个姓刘的做过银行第一把手，就是刘明康，其次是我，我之所以这么成功，与张行长一再的辅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中国大金融要发展下去，我认为它的成败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张老师这样的人才，只要有这样的大金融人才，中国试验大金融和强金融的国家梦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梦实现不只是 GDP，GDP 当中主要的一部分就是金融的成就，而金融的成就不是靠资产，不单纯是靠资金，主要是靠人才，而这个人才必须是国际性的人才，在这点上张行长是当之无愧的，下面有请张行长给我们讲课，有请！

这是张行长拿的一份报纸，是《人民日报》2006 年的一份海外版，是张行长怎么谈法制，如何进行国际金融交易的，我们非常偶然的拿到了，大家可以看看。

张燕玲：

谢谢！刘老师介绍的太好了，我受之有愧。今天王文副院长也说了，他们俩把我介绍得很多了，我还想来个自我介绍，首先我是在

1977 年加入中国银行的，我们国家是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因为那时候我学的是外语，正好改革开放用上了，我们又是做国际贸易，当时中国只有一家银行，就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当时还不独立，是和财政部一家的，我的工作证是财政部国外局。第二年，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了家，我又拿人民银行的工作证。1983 年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出来，1984 年工商银行分出来，后续又建立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出来，那时候还不叫商业银行，叫国有银行。这四家是严格分工的，我记得 1983 年我在人大进修过半年，那时候人大的老师给我们任课，说中国银行是穿皮鞋，农业银行是穿草鞋，工商银行穿布鞋。中国银行就做国外业务，和人民币不沾边，不做人民币业务，只有我们一家有这个历史。我正好在那个时间加入了中国银行，一直随着改革开放走过来，对于国家一系列的大政策，怎么去执行，那时候是国外银行给咱们贷款，不像现在我们支持这儿，支持那儿，那时候是国外给咱们贷款，国外的出口信贷和政府贷款、商业贷款，才开始跟着做起来。就这样一直做到 1991 年，我进入了中国银行的高层领导班子和执行层，2002 年进入到 ICC 银行委员会作副主席，ICC 银行委员会有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在的这十年当中换了三任主席，副主席从来没有换过，副主席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法国人，一位是俄罗斯人，一位是我，我们四个副主席。这些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辛酸的故事，不是你到了国际上人家就认可你，你说的话人家会说你说得不对，或者说的客气点说你

说的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因为当时我们的英语还不是那么强，特别是外国人说得很快，用了很多词，我们理解的时候就有误了，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难受的过程，慢慢的，我们的话语权才越来越多了。

银行委员会这十年当中，我们每出一个文件的时候，无论是开会的通知还是惯例的制定，最后都会有一页写着对这个文件负责的解释权，是这四个副主席，我们要对这个文件负责，所以每个月起码一次

电话会议，经常我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好几个邮件，都是哪个文件交了第几稿，哪个工作组交了第几稿，如果你接到不回答就视为同意。由于十年在这个委员会工作，在 ICC 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在我退休以后他们又帮我推荐到 ICC 的执行层，最高的执行委员会，我的任期是三年，到 2015 年 7 月 1 日。虽然我选上了，可能有的人还希望我很快下去，因为这个话语权，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人，是一

共才十几人。

人们说你的头衔越多，学问越多，其实我不是。我为什么现在是三个职务：一是 ICC 的执董；二是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刚才王文副院长讲了，我特别爱才，我的很多朋友，像雨露校长是我十几年的好朋友，还有陈忠阳是我二十几年的朋友，人大英语教科书也是我写的，本来大家都不认识，通过朋友介绍，见了面，讲了他们的思路 and 想法，我觉得如果

对国家有用，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就支持。虽然刘院长一直给外国人工作，但他是红色的心，这二十几年一直作为好朋友这样下来，大家也经常交换一些思想；另外，我还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票据法研究中心的主任，因为我们国家有《票据法》。但是我认为这个《票据法》很糟糕，很乱。今天不能说，说的话时间就太长了。他们知道我要退休了，就通过关系找到我，我不当这个主任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主任



不好当。银行委员会的前身是汇票、支票、出口信用证委员会，后来因为这个名字不大好，而且入票据的时候各国要收印花税，所以票据的使用就越来越少。票据的影子、功能和所有国际结算规则都必须按照国际上的《票据法》来，所以国际上的《票据法》非常好。

去年在我们那个票据法研究中心，我用了一下午时间，把国际票据法、国内票据法怎么样修改等等做了讲解。我准备了两三个月，在那里讲了两三个小时，把国际上的票据法都讲了一遍。现在拿起来十年、二十年前的《票据法》重新看一遍也挺费劲的。我想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现在要修改《票据法》，我也应该出点力，就这样做的兼职。当时，王院长找我的时候，我说那些人云亦云的，千篇一律的东西我不想参与了，而且我也太累了。我想参与研究的是有经济附加值的、对国家有经济效益的、能对人民、对国家有好处的东西，不是那样的。我一般不研究。我的经济效益不是自己能拿到钱，我现在全部的任职是义务的，我希望能对国家有益。

我跟王文院长说我们国家的研究意义都不太重大，真正对企业有好处、对国家话语权有帮助的研究太欠缺了。王文院长一跟我说他的思路，我听了觉得有用，重阳能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不是我帮助重阳。因为工作了四十多年，我的工龄是1968年开始工作，每年都这么工作，工作得很土，明星也不认识，电影也不看，除了出国飞机的路上能看电影之外，其余连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整天忙工作，所以就想停下来休息休息。

我听王院长讲，觉得能对我有

帮助，本来退下来什么都不想干，想享受退休生活，但这个情结一直放不下，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在国际舞台制定规则时要说上话。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可以说是退而不休，退了以后更忙，以前当行长别人写稿看两下讲讲就行了，现在讲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准备，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的历史是怎样的，所以很难准备我要的东西，这样下来就更忙了。

银行委员会一年两次国际会议，执行董事每年四次国际会议，一个月一次电话会议，每次讨论问题都很激烈。因为有时差，每次开完会中国是10点，早的时候9点，讨论完了以后心情很不好。有的时候我的观点胜利了就很高兴，很快就睡着了，有时候自己的观点被驳了或被顶回来以后就特别憋屈，就会走来走去，心里想这么大一个祖国，我一个老太太在这儿跟人家争，图什么呢？有时候生气就想不干了。后来又看到通知，又考虑这个问题我还要说话，就又来劲了，又跟人吵去了。

我想光我自己这么纠结不如找点知音。我今天来这儿讲也是想找点知音，肯定在座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愿望，但不知道路怎么走。或者有人疑问，你干啥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是保密的。这是国际规则，在哪儿讨论，或国际上定一个什么事儿，新闻发布会没开，我给人讲出去了就不行，所以也有一定的难度。今天来这里跟大家讨论，我想会有人将来接我这个班，如果有那么一两个人，哪怕写一两篇文章，在国际上喊一喊我都没白来。

最近几天，在我准备要做这个

讲座的时候，习主席“两会”以后开始出访，他首先到了莫斯科学院演讲，非常精彩。他说：“合作发展共赢成为时代的潮流，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习主席在德班峰会上讲到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增加金砖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塑造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全球治理体制，前几天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他的主旨演讲又讲到：“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遍布全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几十亿人口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习主席这一系列的讲话里都体现了“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因为在大家主张共同规则的情况下才能有共同的经济体，而且他讲到全球治理体制。听了习主席这几次的讲话非常受鼓舞，所以，我也根据我的工作的体会谈谈全球治理的问题：

第一，对地球村的认识

讲地球村的规则，应该先讲对地球村的认识，当今世界无论是法人、自然人，我们都是主动地、被动地进入地球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识，现在已经进来了。比方说中国的奶粉，三鹿出了问题以后，整个中国奶制品事业就被打得一塌糊涂，消费者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香港就出台了不允许带奶粉，带奶粉坐牢的法规。所以网上出了一个段子：如果一个人怀孕了以后就到香港去，买几罐奶粉到海关，让香港把这个人抓起来，坐牢两年，孩子在那儿出生吃奶粉，等长大以后再回来。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这

个笑话里能悟出很多的东西来。最近，英国、澳大利亚两个国家也开始限制中国游客不允许带奶粉，当然这两个国家不像香港会让带奶粉的人坐牢，这说明香港没有国际视野，哪能让人家坐牢呢？多带一罐奶粉就坐牢，多了你让人家坐得起吗？他没有国际化的思路。

现在我们大陆奶粉企业和国家有关管理者，有人发言（也是我同学）说98%是合理的，网上骂一通，他说那是我说的吗？那是别人写的，又被骂一通。我们应该关注局势的发展，中国的奶业需要强有力的人说话，如果我们不采取什么措施恢复中国人消费自己的奶粉信心的话，你将来在国际上就没有相应的地位了。我们国家都上天了，管理奶粉难吗？管理者没有国际化的意识，香港管理者更没有国际视野，抓到你坐两年牢，那就坐吧，对你的信誉也没什么影响。

今年的“马肉风波”实际是法国西部小肉联加工厂，从南斯拉夫进口了750吨的马肉，550吨贴上欧盟原产标签，实际也可以算成欧盟原产，贴上标签以后也是给一个设在法国卢森堡的肉食加工厂加工了450份食品，售给欧盟13个国家的28个分销商，引起了整个欧盟的紧张，因为我们国家对后面的事件不报道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后面的处理。我们的奶粉应该学人家是怎么处理的，最关键的肯定要恢复信心。一个企业出毛病，一定要站在国际视野上让市场恢复信心，这应该是你做的工作，我们应紧急事件出来以后，看看我们的人怎么处理，怎么说话，说了以后反而让人家更反感。不抓主要矛盾，说明我们没有国际视野。

前几天旅游组织发布2012年中国人海外消费是1020亿美元，已经被认为是全世界旅游消费第一，我们的奢侈品消费全世界第二。作为法人组织，你的国际视野、地球村的概念更应该加强。比如石油业，现在的石油企业有产油国的、非产油国的，实际上石油已经被瓜分完了，非产油国的可能就要投资产油国的，买断它即期和远期采掘权、经营权、出口权或参股。如果不做这样的安排可能十年以后就没有你的事儿了，所以企业作为一种法人要这样，作为国家更要这样，比如金融、货币政策。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开始使用量化宽松政策QE，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准备，人民币从2008年就开始互换，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阿根廷、冰岛、新加坡、新西兰、哈萨克斯坦、泰国等到现在19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2万多亿元人民币，这次又和巴西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巴西央行行长说我们签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无论国际金融市场如何，我们都有300亿美元够用，相当于巴西8个月对华出口额或10个月中国对巴西出口额，足以保证国际贸易运行，降低国际汇率波动给本国双边贸易带来的风险，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去年中巴贸易是750亿人民币。

地球村的概念是加拿大的一个传媒学家麦克卢汉在1967年提出来的，他当时预言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体系正在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环球村正在产生，他所设想的环球村已经实现。麦克卢汉地球村理论是全球化的萌芽，我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深受他的影响。之后类似的全球化

理论研究非常多，比如2005年弗里德曼《地球是平的》，这本书告诉人们地球变平的过程，这本书第二章详细阐述了铲平世界的十大动力，包括开放源代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搜索技术等等，特别是全球化趋势对现有商业模式、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产生的巨大影响，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必须应势而变，把创新作为核心价值观。

我接触了很多，他们今天这么创新，明天那么创新，有的是老酒新瓶，有的说创新就是从国外抓人家一个东西来学习就叫创新，我理解全球村的概念，这个创新核心价值观是站在全球利益上创新，和用全球竞争的观点来创新，我们有的时候把创新理解歪了，要参与全球的管理，中国买啥啥贵，在国际上卖什么什么便宜，因为你没有参与全球管理，所以人家欺负你，中国买这个价格就上去了，中国要出口什么马上价格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全球的管理。在这个变平的世界里，每一个个体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管你过去有多么大，多么优都没有用。诺基亚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都将被迫参与全球整合的业务当中来。你要没有这个意识，大家都不用你的产品，你的企业就会没有了。

企业在变平的世界中成长着，现在的企业都应该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有三个形式：一是国际化的企业。就是立足本国的，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获利，根据国际惯例，有10%—15%的利润来自于海外的就是国际化企业；二是再深一步是跨国企业。在海内外都有机构，独立运营，在全球获利，这样的企业

规模都很大，一般有 100 个国家左右；三是最高的形式是全球整合的企业。整合了全球的优势，在各国承担了最低的成本，他把这个企业分为利润中心、成本中心，有的地方有价值的增长点。国际上银行界早说将来砖瓦银行的业务会越来越小，取代的是在企业价值链、增长点的时候银行产品就进去了，给你贷款和融资，或者要帮你怎么样，银行和企业是这样的关系，由于企业这样的组成就形成了供应链。

为什么老提供应链？因为供应链这个词在我们国家也给用错



了。这样，企业就会产生税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进出口统计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组织里很多专家也在考虑这些问题，怎么样推进。因此最高层次的企业是利用全球最高效的资源工作的企业。

北京是国际化的城市，去年在 ICC 世界工商领袖大会上，这是我们北京市陈功（音）副司长用的数据，可能今年会有一些变化，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个北京有这么多的外国企业和投资机构，我们国家在国外也有，比如 China Town

唐人街，现在到任何国家大一点的城市里都有唐人街，没有唐人街也有 China 餐馆，全世界似乎都有我们的中国餐馆。还有孔子学院，2004 年在韩国成立了首家孔子学院，到 2009 年我们在 88 个国家建立了 2824 个孔子学院和 272 个孔子课堂。所以，你参不参与，愿不愿意都会被全球化影响和制约。

比如碳排放，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碳排放，没有工业，发达国家随便排放，现在发展中国家起来了，去年我们争的最多的是欧盟要

收我们的飞机碳排放税。我想说的是，它提出这个问题就有人响应，包括发展中国家，人家有本事说服你过量碳排放对全球造成什么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减排，既然要减排，我们就出来一些国际规则，有条款和条约，后面的金融就跟上了，碳排放交易随之产生了。碳排互换，是有期权的，我用不了那么多，把期权卖给你，你现在可以用，将来可以用。你愿不愿意鼻子都已经给人家牵到那儿去了，你就必须那样做。

二、地球村的治理机制

地球村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 年的统计是 193 个成员。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宗教信仰不同，但在 UN 和 G20 这些国际组织，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制订的公约、法规规则，以及根据这些规则行事的法院、仲裁院、国际法庭，在他们的治理下每天顺利地进行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经济、金融的交流、交往和交易。尽管局部也有一些不和谐，但是这些规则约束着地球村的人们在海陆空以及宇宙的一切活动，其中被约束

最多的活动还是和经济利益关联的商业活动。

根据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介绍一下商业组织 ICC 国际商会，它自称是商业规则的制订者。ICC 的历史是，1919 年一战刚过，三位美国商界领袖来到欧洲，想找能代表欧洲商人的机构来成立一个国际商业组织，重建一战之后满目疮痍的国际经济。他们从美国出发的时候，这三个人就说了“我们可能是疯了，但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他们一站到了英国就受到冷遇，没人理他们。幸运的是，他们到法国以后，见到了时任法国商务部长的爱提安·克莱蒙代尔（音译）。克莱蒙代尔这个人非常有思想，他的功劳很大，现在国际组织很多机构注册在法国，法国赚大了，提升了法国在就业、话语权、语言（必须用英文和法文）等方面的影响力。在他的支持下，几个月以后欧洲一个重要代表团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在新泽西大西洋城召开了国际会议，共耗费 6 天时间写出了 ICC 的章程。他们自认为这个章程早于联合国，且比联合国还好，因为他们是商界的领袖。

ICC 的定位有三个：国际商业组织，代表全球企业和权力机构进行对话，总部在巴黎；下面有各委员会 2000 多名专家在为 ICC 制定各个特定领域的规则；联合国、WTO、G20 和其他全球地区和国际组织都是通过 ICC 来听取商界意见。我参加过三次会议，给 G20 写政策报告。它的日常大量工作是制订行为规则、解决争议和纠纷。我们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谁把它告到这儿，法院仲裁大量的问题在这儿解决，两个国家出了矛盾也不

愿意太伤感情，就到 ICC 来告状，我们就出专家意见，那边服了就算了，这事情就解决了。有时候不服专家意见就会拿到大会上讨论，形成 Case，中国也是经常上那个上面的，所以我们在上面也有很多麻烦。国际商会有 20 多个机构，有主席 1 人，任期两年，两年以后还可以当两年名誉主席，就不允许再当了，副主席只允许有两位，现在主席下周我马上要去开会选新的主席和副主席，现在主席是美国人，副主席是印度人，我是执行董事，任期是三年，有十多位。

ICC 的程序是先有名人推荐你，把你推荐到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考察，主要考察你的国际事务的经验和能力，你对 ICC 理念的认同的程度，以及你的专业、信誉等。提名委员会考察认为可以以后就报告给董事会，在董事会上进行讨论，董事会决议通过后，把这个人推荐到 WCF（世界商会大会），进行投票选举才行。当时商会的主席是香港的冯国金（音）先生，他找到我，说我要推荐你到那儿去，我说我要退休了，退休后出国开会很麻烦的。他说我知道你退休了才推荐你，根据你在 ICC 的影响力，你没有职务了也能选上，我们国家需要有代表，我马上就不是了，我们大中华就没有代表了，你应该主动承担这个责任。我想香港资本家都有这个觉悟，我要没有这个觉悟好像不合适，我说行啊，感谢你推荐，但我可能选不上，因为我知道这个程序。结果 12 月份他跟我谈的，2 月份就告诉我已经被选入到了提名委员会，3 月份就给我发了一个贺信——董事会已经同意把你交到世界大会上投票，7 月

份给我来信祝贺我成功当选。我应该给人家回话，但这时候我不敢回话，因为不知道国家让不让我去。结果说需要很高层次的批准，我更不敢给人家回话。我问董事会如果领导不批怎么办？他就说你以个人的原因辞职。最后还好，因为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就在北京开，也是第一次在北京开会，请示后获批就可以参加，感触特别大。

这里面有很多委员会，像价格术语、合同范本以及必须做的规则。银行委员会到 2011 年就已经 80 周年了，那时候在中国开会，我是执行主席，我当时提出来 80 周年要庆祝，要出一本书，把我们 80 年的东西汇编成一本书。他们说不要搞，太麻烦了，人都活着，不好评价。每个月通一次电话时我就提这事儿，把书的第一部分内容是什么，第二部分内容是什么讲述出来，并且告诉他资金和后续事项都由我来做。我和俄罗斯一个代表一直是同盟、好朋友，当我第三次提出时，他说你是不是想给我们送点礼，你做个背心就算了。我逮着机会了，说背心绝对不做，两次你都把背心放到洗衣机里用没了，我绝对不做那个，一定要出书。之后又说了很多次，他们最后同意了。我说派两个人到总部来拿一些资料，回来要做个大事记，他们可能因为敏感，就说你不用来了，找一个你的好朋友——在银行委员会工作很多年的前任秘书长来做编辑。和他一块儿合作我放心。这本书出来以后影响特别好，因为那么多委员会，只有我们委员会能把 ICC 的 80 年历史给弄出来，各个委员会都挺羡慕，所以我那时候也有点威信。我们除了

在会上发以外，他们要求我们给每个国家送一本，因为中国银行掏的钱，就将其作为礼品送给中国银行。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临时进出口免税 ATA 是我们商会做的，还有产地证，国际仲裁院。1913 年到今年是 90 年，应该利用 90 年应该写点文章。我们中国是 1986 年申请加入 ICC，1994 年 11 月 8 日获批的，1995 年 1 月 1 日在贸促会，ICC China 成立了。

我们加入了这么长时间，银行委员会第一次在中国开会却是 2011 年，当时是我拼命地争，本来争的是 2010 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会议组织得很好，但没有想到欧洲火山爆发，他们也有点抵抗，就不来了。最后也来了一部分，但是会没有开成，我们就在北京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补救了一下。我说 2010 年春季没开成就秋季开，秋季会议原来定在美国，美国坚决不让步。137 次董事会最后才在中国第一次开会，有权力的人不上你这儿来的，因为他上这儿来很多核心的东西就被你掌握了。其实到现在，现场董事会我只参加了北京这一次，但是下周我要去参加。参加董事会我的感触非常深，在北京商界领袖上开会我发言了，我说我是新上任的，我还以为走错门到了中央党校，商会主席都是各国商界的领袖，都是大资本家，我说没想到你们大资本家讨论的是怎么样解救全球最苦的人，怎么样解救全球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让他们融资，让他们发展起来，怎么样让全球尽快转出危机。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事儿吗？共产党最早也都是那些人，把共产党最开始的一些代表人物介绍一下，这些人都是资本家。

只有我们这些人引导一个企业，进行全球化，我们才有说话的权利。我还是受共产党影响太多，觉得你们还是为利。保留一点自己的观点也没什么不好的。

三、谈谈我这几次会议上批准的国际惯例

第 136 次我没参加，会议纪要要有记录他们怎么介绍有我进来，比如中国张燕玲被选通过了，她进来的意义，一是中国有代表了，中国现在得有代表；二是她是位女士，我们这边也得有女士；三是批准了一些文件：有争端解决机制、海关指引、环境税法、财政工具和环境政策、互联网上言论自由和信息交流自由。这些都是规则，绝大多数连我都不知道。

第 137 次我参加了，我对此有点发言权，当时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文件，我特别害怕，是互联网的一个规则。我拿到文件以后，看这些讨论文件不像银行委员会的东西，我说赶紧让贸促会专门成立一个处，为 ICC 这块服务的。我说得赶紧把所有的文件给有关部委拿过去，帮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问题，我好表决，尽管这些文件是保密的。结果他们回复说这些全同意，但有一个不同意，说中国坚决不允许反动的信息进到我们这里来。

第一，国际销售范本。

一是平衡进出口商、委托人、代理人、分销商、经销商各方面的利益，它有几个特点：1. 结合国际贸易处的规则，2. 结合银行付款责任 BPO，BPO 现在在国际上是被认可的，是在国际上做供应链融资的第一个产品。我们国家现在供应链上有多少产品？有的说十个，有的说二十个，一点都没有和国际接轨。

国内有些国际化大银行也这样说，不听我的。

二是反映数字、科技、智能新成果；

三是言简意赅的商务语言；

四是减少合同法在法律方面的偏见，推动全球化发展。

整个合同范本都改了，要求你以后签合同用这个范本，不知道我们国家对企业有没有范本，这点得拿出来研究一下，下一步我要到贸促会谈一谈，了解一下是否制定范本，如果不行我们要考虑是否译成中文，是否要培训。

第二，反腐败的条款。

第三，跨境法律援助。

第四，粮食、饮料、营销沟通工作的框架。这是对 2006 年 ICC 广告营销统一规则的制定，我们国家这方面的国际化可能没太跟不上。

第 138 次的我也没去，里面有几个文件，一是 ICC Program，二是 ICC 的 UIF，UIF 是银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化贸易产品，以前同事翻译成票据包买，实际就是一个债权债务的买断，无追索权的买断。现在根据巴塞尔的要求，对上市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是业绩发布的时候。公司如果有一笔债权，可以把它卖给银行，银行是有追索权的，银行如果手里资产多的话也可以到第二市场卖掉。这个规则是第一市场、第二市场的规则，一共有二十几条。这个规则的好处是能够增加资产的流动性，改善资产负债表。三是 ICC 在线行为广告自律指南。

第 139 次是我近期要去参加的会，要批准的几个文件是：1. UIBPO（银行付款责任），我们本身有一

个规则，现在 URBPO 是另一个统一规则；2. ISBP（国际银行标准实务），在原来的条款基础上有修改。2002 年国际商会采访我，我给他们介绍 ISBP 在中国的情况，说实话 2002 年还有点心虚，但我胆子挺大，说是完全按 ISBP 做的。实际我自己都忘了，后来和老刘拿着报纸才看见当年采访我的情况。为什么要修改 ISBP 呢？因为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了，ISBP 必须要修改。它整个修改过程我们全参与了，能把握住，对中国没什么不利的。

这四次批准的文件是什么意思呢？在包括海关的各个领域，新的国际秩序都在建立，如果我们国家事先有人能研究这每份文件的内容，分析它的利弊以及在我们国家的可行性，并且对中国的企业加以指导就更好了。如果我们有人能参与这些规则制定，引导这些国际规则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起码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样才符合我们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我参加过第 137 次现场会，会议纪要一共有 7 页，我的发言占了 1 页半，我为什么说那么长时间的话，因为前面 136 次，我们没有参加。里面的纪要有一段对中国很不好，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在介绍情况，说有一个负面的情况来自于中国，在会上我就详细地解释了中国真实的情况，并建议这块重新写。137 次会议要重新写 36 次纪要，我说有误解的地方都被记录了，所以只要我们说的有理有据，人家还是认同的。

刚才我说的是批准的这些文件，ICC 还有其他的工作。我还想介绍其他两个工作，一是国际商界

世界贸易议程，二是 G20 政策对话。这次会议为什么要在多哈开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多哈回合已经停了 11 年，它的问题在于，政府间必要条款你都同意了我才签，都同意就很麻烦，可能这个条款同意那个条款不同意，只要有一个不同意就不签，就停在那里，但绝大多数还是达成一致意见的。我在那儿开会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很厉害，说谁谁知识太欠缺，他们对国际判断失误，多哈回合必须重新启动。但从政府角度启动太难了，就想把多哈里比较多的东西拽出来。十年里，WTO 整天说国际贸易，原来是我想买个东西上你那儿买，现在是不买你的东西，我投资，把你的权给买了，到你那儿建个厂，或把你的股权买了。比如我生产鞋，跑到中国弄一大堆鞋厂但知识产权在他那儿，厂在你这儿，你就是个加工厂。

所以这个统计很难，包括国际上有一些数字也是有政治的，想高就高，想低就低，也会把一些惯例加进来。他们就想来个商界多哈回合，有五个重要部分：一是达成促进贸易的协议；二是在 WTO 框架下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三是贸易和服务自由化；四是利用数字信息完成跨境贸易结算；五是投资协议，建立投资协议规则，使之透明和可预测。我们现在到非洲或其他地区投资，给我们戴上很多很难听的帽子，如果有那么一个协议的话，我们的投资就很透明、可预测，也能减少他们的争论。

关于 G20，我们给它做政策建议。这次会议邀请团里说“本次会议将向 2013 年 G20 会议邀请提出关于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政策建议。”和 G20 政策层面的对

话其实从 G7、G8 就开始了，每次大国首脑开会有一个对应的 B20 峰会，商界领袖都要发言，参加 G20 的领导也带着一大堆能影响国际的商人。ICC 认为 G20 是世界治理的工具，世界现在需要这样一个治理工具，能改善我们对世界的管理，应成一个体系和体制。但 G20 现在还没有常设机构，就是轮值，到谁那儿谁都可以想着对我有利，使得政策之间不是很关联。ICC 就认为，我们有能力来使这个机构建立常设机构，让这个机构成为商业发展的平台和工具，能拿出连续的政策性建议，使政府首脑在 G20 峰会上共同讨论这些重要话题。

四、G20 的背景。

1997 年亚洲危机爆发的时候，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西方发达国家，还需要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所以 1999 年 7 月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华盛顿开会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同意建立 G20，在 9 月 25 日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论坛，G8 会议上就宣布成立了 G20。以后 G20 就成了一个非常权威的组织。

我了解的 G20 批准两个规则的想法：一是巴塞尔 III，巴塞尔 III 是巴塞尔委员提交给 G20 讨论，提交之前要征求意见，7、8 月份征求意见的时候，我的意见就发不出了，前两天秘书说巴塞尔有一个征求意见稿过来，你想不想看？我看了这 80 多页的内容感觉不行，它说金融危机是因为那些银行表外银行做得太大，虚拟经济推动产生的金融危机，所以就要把表外都拿到表内计算，我一看这不合理。危机

是西方的银行搞的衍生产品，我们发展中国家没有那么多衍生产品，我们的衍生产品表外是贸易融资，如果把贸易融资从表外拿到表内对我们影响非常大，银行就没法干了。他说表内的产品期限都是一年，贸易融资不只是一年的，也有半个月的、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如果都统一规定成一年是不合理的。

我看这不行就马上写。欧洲那时候和我们有时差，我找了两个信任的同事，说你看对不对，帮我修改，但意思不要改掉，巴塞尔 III 这块是对国际恢复经济走出低谷是对（我国）贸易的极大损害。我们银行委员会这些主席都是专家，一看说这说得大对了，都给我回邮件，说你写的太好了，马上就把我的意见转交给巴塞尔委员会，结果巴塞尔委员会没有理我们 ICC，就在首尔峰会通过了，我们在美国布兰多开会，他们邀请我做一个演讲，我做的 PPT 非常详细，谈的问题非常详细。这是怎么回事，会造成什么影响，一步步分析。我还没下台，WTO 拉米的助理找我说我们就缺懂实务的人，尽是专家，你这么 PPT 一说我们就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说我回去得请示，就回来请示了，派了另外一个同事，到现在都好几年了，他们一开会就说那个人是代表我去的，实际就是因为这次演讲有影响。

WTO、ICC 和 World Bank 一起向 G20 写了一封信给主席，我在中国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拿我的第一篇文章，贸促会翻译成英文了，就拿着这个稿子到峰会上演讲，演讲之后大受欢迎，他还给我写了一个信，感谢你的辛苦劳动，你基本是按照这上面讲的。那次也是有原因

的，巴塞尔的意见是我首次提出的，之后巴塞尔委员会要求制订小组重新讨论，他们就重新看了我们的意见。他说你们说贸易融资风险小，没有数据，我们就开始做数据，到现在还在做，现在国内的专家也不理解，要是我说的可能人家还不爱听，相信外国人。

外国人说贸易融资的风险不是企业的风险，你企业的信誉多好多差和贸易融资没关系，贸易融资就是货物融资的，它是我的抵押品，它不行我就把它收了，货卖出去它就自強了，是自強性的。国内非得把它和贷款一块儿弄，根本不是一回事。保函更不用提了，保函就是证明我是谁谁谁，我来投标，中标就保证履约，不中标就没什么可说的。银行开保函，你非要扣人家的信用额度，企业有多大的负担？你不懂真是没办法。这个话我们说的很多次一直没有什么效果。

一年以后，在中国开会那一次，巴塞尔委员会的副主席在台上讲，你们 ICC 提出的那些问题全部解决了，接着讲怎么解决的。我在下面坐着，就站起来了，说没解决，发达国家的都解决了，但发展中国家没解决，我就拉着俄罗斯，说像中国和俄罗斯就没解决。欧洲、美国在巴 II 的时候都执行了，我们巴 II 没执行，一直执行的是巴 I，没执行巴 II 就没有数据，现在执行巴 III，就是重新弄数据，等于用的是内评法。我很遗憾，在那个会上发了言，估计也没有人真是引起重视，中国怎么样补救，也不能说一点没补救，银监会每次反馈意见还都让我说，征求我的意见，但我觉得还是没有落实好。

还是巴塞尔批准的，叫全球系

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其实这是在加纳第六次峰会上批准的，是 FSB（金融稳定局）批准的，金融稳定局第二次伦敦峰会上批的，说要用金融稳定局取代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这个金融稳定局和 IMF 一道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风险进行监测，他们提出了 29 家银行，其中就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进去了都不知道。所以像巴塞尔 III 我反对了就有人改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

重建国际秩序的暗战日趋激烈。现在地球村、国际化、金融危机，世界格局的变化，要完善国际经济规则，实际上这在联合国的时候就提出来了，现在实际情况发生了很

多的变化，新一轮又开始，应该是重新来做的，而且现有的这些规则从形式上是公平的，因为你都同意了，你也有人参与。讲它是公正的，是指它的是按条款办事的，拿条款套，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因为在指定、执行、判断时都存在着各种价值观与话语权的迥异，而且有时候你的意见根本没有被采纳，或别人根本不让你讲，各国在参与方面也不尽相同，很多参会的人到会也不发言。

五、具体建议

第一，建议国家设立专门的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国际秩序，地球村游戏规则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协助收集参与的单位或参与专家，他们

在国际活动中的表现、收获和经验。第二，利用学术界的优势，像我们大学里梳理国际治理的法律法规一样，打一场人民战争，学界、媒体来结合，对不公正的内容尽快提出我们的修改意见。

第三，及时宣传介绍惯例，以便更好地利用规则保护自己。

第四，要及时地交流各方信息，研讨并跟进正在修订、制订中的规则，并且引领制定规则，改变过去事后反对，盲目跟从的情况，话语权的培养还需要长时间的，胆子大还不行，需要知识、信誉、感召力、影响力。

总结，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思维，要“换脑子”，要对应，参

与竞争，参与制订规则，管理这个世界，这是当前最急迫的工作。

我就说这些，谢谢！（鼓掌）

刘志勤：

非常感谢你的报告，您一定要担任重阳金融学院的研究员。刚才张行长讲的很多案例没有办法在理论上有更多的阐述，但在实践上都已经说明了全球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游戏规则的重要性，特别是最后关于暗战的问题。中国要发展大金融、强金融的国家，实现“中国梦”，不参与制订游戏规则无从谈起，就像中国式过马路，没有规则是绝对不行的。张行长在这方面有非常卓越的见解。巴塞尔协议非常具体，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完全懂，张行长在这次会议上的坚持挽救了中国的贸易。我这么说决不是过高或夸张，如果她不坚持，中国各大银行在做国际贸易方面会吃很大的亏，而且把表外做成表内，中国的贸易基本就死定了。中国在澳大利亚、智利、印度买了那么多的矿产和石油，都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规则执行的，如果按巴塞尔协议执行，很多事情中国就不能做，损失非常大，我们的 GDP 就会在第三、第四徘徊，而不是今天的第二大经济体。感谢张行长在这上面所做的贡献。我给王老师提个要求，希望这个贡献要提供至国家层面给予奖励，因为它挽救了中国的金融和权威。这个贡献不是朱民和林毅夫做出的，是张行长在那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



问答环节

问：我是重阳金融学院的工作人员。我的问题是，张行长讲的时候，我理解最重要的是告诉了我们在现在世界格局非常重要的变化基础是国际微观基础变化，国际规则也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争取国际话语权，里面的变化最核心的是，一是由于全球分工体系变化，发达国家控制了规则领域的东西，比如知识产权，利用你们国家进行低成本生产；二是国际治理框架网络，已经积累了 100 多年以上

智库体系，我们去研究利益在什么地方，主张我们的利益。我觉得西方国家事先把规则制定在那儿，明明说的对他很有利，对你很不利，但说的很道貌岸然，但有大量的先期调研体系在那儿。我想问，我们这样的先期调研体系和发达国家有多大差距，差距在什么地方？

张燕玲：我们国家真的不缺人才，1983 年我们一些老前行长特别有前瞻性，拿出 30 万美元和配套 300 万人民币支持了人大、复旦、武大三所学校成立的国际金融

见得没人掌握，可能有哪几个案例就有那几个人掌握。我们国家非常保守，但我个人不保守，只是没有这个条件。最高层要有人抓这个事情，把我们的资源好好利用起来。现在我们的学生写论文，你们学生还好一些，有时间会找资料来写，在职读研究生和博士的就抄。国际上雇员工都要把简历给我看，我看了以后特别有感触，人家介绍经验的时候说我写了什么论文，我在哪儿引用。不像我们，人家有好几个，比如我们学校的教授，或有一个是银行的，假如是我，一看这人说我

页我的名字没抄，其他全变成他的了。有人拿着这本书说这不是你的书吗？你认识他？我不认识，但有名字，就知道是哪个学校的。我就找到那个人，给他打了个电话。那人特别好，见了我就诉苦，说张老师，要评职称，没书不行，我就把你这个书给抄了。我说你看咋办。他说我把稿费全给你，你别说我。我就真的没说，他给我送稿费时我还谦让一下，我说你拿走吧，我不要。他和爱人一块儿来的，那时候出一本书几千元，一个信封，他就把钱放在这儿，我说那就请全部门

因在于我们缺乏交流，整个资源也没有好好利用。我看习主席的讲话，对国际秩序这么关注的话，只要有人能抓就行，这个人不一定是专家，只要把各个学校的资源都利用起来就可以。《票据法》就是，政法大学有那么多系，我说你们有这么多系，把国外的法都给翻译过来，都给弄出来，有的同学论文写这个，有的同学论文写那个，我们还自己找些破玩意儿，什么都不是吗？那个法规没出的时候我就提意见，人大专门有人找你，你不要再提了，我们这个法通过了以后两年就改，

题，中国全球化的过程有两个问题：一是起步晚，二是步伐比较慢。现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也有几个方式，积极参与现有过程，比如 ICC，还有曾经创立一个中国为首的国际规则，比如金砖五国的应急基金，您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怎样的？哪一个更适合现行的中国？

张燕玲：我本来就想讲金砖这个事儿，这次 2008 年金融危机出来了以后其实受害最大的就是金砖，现在全世界都承认危机当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引领了全球发展的火



历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网络，虽然不进行生产了，但把持着国际规则的制定，而且利用种种已经先占位置的优势，无视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利益要求甚至损害你的利益。由于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工业国家和贸易出口国，争取话语权是重要，但像张行长说的，我们确实非常需要事先研究清楚我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比较前瞻性地主张我们的利益，而不是别人把规则制订了我们再去反对，我们要前瞻性地主张我们的利益，就应该有比较大的国家

系，当时我们国家没有国际金融系，只有财经系，我 1983 年在这儿进修的时候是财经系，没有金融系，国际金融系更别提了。后来就多了，我曾经也当过好几个大学里的董事，因为我们掏钱，就得派董事。各大学的人才其实挺多的，特别是现在小朋友的物理、化学、外语都好，没有强强联合不行，明明金融机构，像我，人家支持你到大学里给他们讲一讲，或者把你的（经验介绍给同学），但各个单位都保密、保守。刚才说的那些东西也不

认识，这人是他的导师。人家的导师有这儿那儿的指导我们的论文，我们国家没有的，全是学校的，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智商、英文很高，但到业务单位得有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和跟上。有时候出去开会陪的小朋友特别好，前几年真给你拎包，他对历史这些都不懂。

比如《国际结算》这本书是我 1984 年写的，很多专家告诉我信用证有红条款、绿条款，我就往上面写，写的越多就越多人关注。书刚出版时，有一个教授除了第一

的人吃饭。

我是举个例子，教授都不知道，都来抄你的东西。后来 90 年代我又写了一本《国际结算》这本书，所有金融界看了这本书，说是看着你这本书长大的，但现在谁都不敢写，但学校这种书不停地出，我要退休，说要写书了，他们问你要什么帮忙？我说需要从市场上找一些书过来。书找来以后，我发现，最简单的信用证的种类都是过时的，早就不用了，惯例都改好几回了，可是大学里还在学。我认为主要原

可是过了十年都没改，人民币马上是本票，《票据法》那样，如果有人出来给你质疑怎么办。所以有些人脑袋没有进大国际化视野当中。不知道算不算回答你的问题，应该有人组织，中国不缺人才。

刘志勤：缺管理，过马路的人很多，管理的人不多，所以就乱出招。

问：张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研二的学生，我有一个问

车头，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反过来说就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就是货币战争，成为受害者。在前年三亚金砖峰会上，下午有一场论坛是我主持的，专门讨论金融问题，我先有一段讲话，说我们的货币应该怎么样，我们之间的贸易、货币这么大，应该建立基金，所以，这次会议上我们最大的成功是要建立一个开发银行，建立一个外汇储备库，起始资金 1000 亿美元，中国做的贡献大，占了 410 亿，还成立了一个工商理事会，这本来是一个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我们成立银行就想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提供帮助，因为他得不到贷款，从世界银行 IMF 得到的贷款并不多，采用储备库，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变化不影响我们，但西方媒体很紧张，表现得很过度。今年我们国家出口增长了 17%，GDP 没涨，那说明什么？我们国家还是贸易大，说白了就是拿钱收的外汇，拿外汇光买你的美国国债和日债。这是几年之前，也是我特别纠结的一个事儿。

几年前我国的专家乃至全世界的专家都说了，2008 年金融危机，2009 年美国就酝酿出 QE，专家说美国箭在弦上必须得这样做了，如果不这样做就救不了世界的经济。欧盟发不了，美国发钞世界给扛，但欧盟国家没有印钞机，欧盟一些国家危机你们都知道了，希腊等被救，确实条件也是挺苛刻的。现在美国发到 QE4，欧盟也开始发，日本也开始发，发的还最大，比美国还厉害。今天人民币创新高，美元还比日元高，就是美国让他。过去日元一说要升值，一说要贬值美国一砖头给他拍了不让它弄，现在美国让他这么做，实际这些国家利用了他们是国际通用的货币，你做贸易只能拿走我的钱，现在我美债第一，日债也第一，欧债我们也差不多第一 现在我们出口 17% 的增长，再弄点你的债，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怎么办？我们做那么点事儿他们又不干了。

所以你说哪个好，我觉得那也得参与，得增加话语权，这个也得做，再不做我们的吃亏就太大了。

刘志勤：中国现在是在为全世界打工！

问：张行长，您刚才谈的问题是国际贸易当中的游戏公共规则问题，应对这些公共游戏规则国内需要进行更多的合作，习主席提出的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不仅国际上需要，国内也非常需要，合作共赢这个理念，每次我们讲国际规则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提这样，这样更加复杂。如果大家更多从共赢角度提，去切入我想可能更容易一些，可能国际面积大，不太好切入。

国内一定要提示各种能力，包括商业能力、公共关系能力、社会能力、政治能力，学者之间的共赢，卖奶粉之间的共赢，开发商、民众、政府有机共赢等，如果没有这种共赢的社会能力，这种共赢的能力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国际游戏规则参与过程和国际合作过程？

刘志勤：问题实际是以共赢为主还是合作为主，共赢为手段还是合作为手段？

问：是个体利益的互换为主，还是大家制定规则更多从公共规则角度为主。

张燕玲：我们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可以强调合作共赢，但在国际上很难，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以我们为例，每次见面大家互相拥抱，一谈问题就会变脸，谁也不会让谁。你在那儿时间长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也有点互相的信任，有点感情和交情，往往你说的什么我支持你一下。但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实际斗争大于合作。最后还是谁强权，谁话语权大，大家就服他。

但有的事情是有历史的，我为什么要了解前面的历史，你讲话就有话语权了。过去航运大的时候提单怎么说，这里面的故事太多了，有很多的议题，你那时候这么说，现在中国大了，你变过来了是不行的；你那时候大的你们谁谁谁怎么说的，你得了解这个，最后谁的知识多，掌握的信息多，谁的技巧多谁能战胜，决不是大家都把心态放得很好，我们俩一起共赢，赢也有大有小，就像家里一个事儿也有谁占便宜多谁占便宜少。我们得把自己先弄强壮了，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去扎扎实实学业务和知识，现在很多人不是学这个，金融口说你学这个，跟你们前辈学这个，能当行长的也就你自己，其他一些人弄一半就折了，搞业务不行。实际上我们中国现在要强大就得从头，没有这个，说在国际上咱俩共赢怎么可能。

刘志勤：我非常同意，因为共赢是政治家的口号，企业家不这么想的，搞手机的你会做得比我强不可能，会有斗争，只不过大伙儿赚多赚少的问题。

问：张行长，刚才您讲你们在 ICC 任副主席，我们为您感到自豪的时候有点为您憋气，讲到参与国际制定规则的问题，刚才北大的同学讲了，我们也有另起炉灶的办法，比如金砖五国搞基金，您是否赞同我们国家再出面组织金砖五国搞个新兴国家或整个第三世界的 ICC 组织呢？

张燕玲：应该双管齐下，因为现在就算在金砖五国，那天《福

布斯》杂志上说了一段话，“金砖峰会是个奇怪的同床（异梦）之间的交易，对这次峰会一眼能看出两点，一是中国是这场秀的明星，二是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共同点”，难吗？现在这些国家里意见是一致的吗？不是，现在西方国家在里面加蝎子，说很多难听的话。你要搞的话会可能搞出什么呢？穷兄弟穷得不得了的全跑你这儿来了，让你背起来了，那惨了，所以我觉得另起炉灶不现实，双管齐下还是可以的，搞点地区性的。本来前几年东盟搞的挺红火的，现在一搞金砖，东盟他们自己弄去了，而且日本还说东盟要替代金砖，他是发展的火车头，金砖不行了，中国下坡了，俄罗斯也下来了，说的很难听，但他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这是日本一个学者写的一篇文章。所以我说日本在起哄，《日本经济新闻》4 月 1 日的文章，说“世界增长的引擎由金砖国家转向东南亚，长期以来，金砖国家的高速增长一直是新兴国家的浪潮标志，但中国经济正在走入低谷，除南非之外的其余三国经济也持续不振，取而代之的是东南亚的经济蒸蒸日上，2008 年金融危机为契机，世界增长的发动机正在转换（他说 2008 年就转换了）。IMF 统计，2005 年 -2007 年印度的增长率为 9.5%，但 2010 年 -2012 年降到 7.3%；俄罗斯的经济曾经受益于资源涨价，但其增速也从 7.7% 到 4.1%，巴西则陷入了物价上涨和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

我对 IMF 非常反感，这次 G20 本来大家都猜想要争 QE 的问题，结果这个会上没争，大家出乎意料，为什么？掌门人 IMF 说这是徒劳

的，汇率的争论是不合适的，没有意义的，IMF 给 G20 的报告说市场对日元的贬值担心被夸大。那篇文章里，IMF 统计数字也说明不了那么多问题，他就敢下这样的结论，你不就是日本的一个学者吗？中国转他（文章）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马上写一篇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批他，要不然很多没有经济知识的中国人会被误导。王文你那时候搞媒体还搞的挺好的，你弄个西方的文章，这个文章不伦不类，不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得马上有人出来说话，两篇文章一块儿登。我们现在媒体也比较自由了，登反面的东西多，这好，我看到反面的东西就特别生气，说胡说八道，这不对那不对什么的，但绝大多数人没有那个知识，会说咱中国现在这样？一会儿他把你说的好的不得了，一会儿把你说的坏得不得了。说你坏得不得了，你一定要说话。

最近我们说“中国模式”，现在西方对中国模式是“妖魔化”，不是中国现在经济上去了，他认为你那是国家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不是说你好，所以也是要么那些国家接受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对国际形势要进行正确的评价。人家到你国家来说你两句好话，我们就使劲说，他回去就说坏话。看外文的报纸不多，回来的人都说自己好。至于中国能不能再搞一套，我认为不行，必须得双管齐下，必须先参与他的，参与他的过程才知道你将来怎么建立。甚至我们应该有能力把它那个（游戏规则）给改了。

你说辛酸那个，我讲个辛酸的，原来我一发言他们就顶我，顶得挺难受的。后来换成一个奥地利的主席，她虽然英语比我好，但也不是

母语，我们俩是女的，每次在一起聊的比较多，我说你看我们这个秩序不好，每次抢着发言，有的人一发言就说那么多，她特别同意我，她说这样，我们俩把游戏规则给改了，一个人不许老发言，我们主席就五个人，不许你一个人老说，你说完了就别说了，我们四个人都说完了你再说第二回，或者我们四个人都没说的了你再说。把这个游戏规则按中国的方式给改过来。他们挺生气的，因为有的人特爱说。

第二个游戏规则是改为，你要说的话，除非马上开会你想出来的，本来这个会上我要提什么，必须用邮件告诉我们，我要说什么，我们再用邮件跟你讨论，不能到会上你说一大堆东西，我们根本跟不上，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就把这个规则也给改了，事先发邮件，这样特别有利，我可以给同事事先看有哪些不对的，我自己也就知道怎么样应对。这是参与和改它的游戏规则，后面再有大量的人支持，我想中国就应该没事儿。别再另起炉灶，那不是随便能另起的问题。前两年林毅夫提的那个事儿，说 G2（中国和美国），我当时在国外说胡扯，我整天在外面看着，中国能上去吗？那还不被骂死，别人都会来反对你。这是不可能的。

刘志勤：谢谢张行长的回答。确实时间太短，希望将来有机会我们能接触到张行长更多的思想，下面请王文副院长讲话。

王文：

谢谢张老师和刘老师，讲话谈不上，我谈两点感受：第一，以前

我在环球时报主管评论和社论，我说中国走出去面临着枪林弹雨，硝烟弥漫，我说我就是那个国际舆论场下的排头兵，今天听完之后的感受，不仅仅是舆论在战争，贸易、金融、银行业，中国走出去处处都面临着战争，如果我是排头兵的话，张行长就是常胜将军，这两天放的电影杨家将，我觉得余太君战胜归来以后给我们徒子徒孙们讲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虽然辛酸，我们也非常有收获。今天您讲的不是游戏规则，而是战争规则，涉及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第二，我突然想起过去老人家传下来的话，家有一老如获一宝，我觉得张行长是我们人大重阳的宝，是我们人大的宝，是我们中国的宝，所以我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她致敬！

为了张行长和刘老师这个宝，我也给大家一个公开的承诺，您刚才讲的一些国际结算等等，我一定

当作我们研究院今年一个重要的项目来抓，争取年底的时候能向您交出满意的答卷。但是问题又来了，两个月前，陈雨露校长在这个会议室宣布我们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建立人大重阳金融学院呢？为什么在这里选址呢？因为这边开窗就是社会，那边开窗就是人大校园，依靠校园，面向社会，希望能以开放的姿态，向社会吸取越来越多的人才，吸取越来越多的问题，来把这个智库办好。所以，今天我最后有一个邀请，邀约各位如果有兴趣，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人大重阳来，为我们这份事业和张老师、刘老师的一些心愿继承这些事业，做这些事业。这正式向大家邀约。

最后一个通知，下周周三同一时间，我们有幸请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这个会场做他的

演讲，他个人在舆论场上怎么样面对国际游戏规则，给大家讲讲他的感受。

今天再次谢谢大家！感谢刘老师，感谢张老师！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结束）

